

西德中等教育的改革

——從理念到政策，再到課程——

徐南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一、教育改革的現況

由理念到政策

西德教育改革的速度，最近顯得特別迅速。二次大戰後的教育改革，以緩慢（langsam）而踏實（sicher）的步調進行，但最近兩三年的教育改革，其進行步調已顯然改變。例如被稱為教育政策專家（一九六七年擔任赫森邦教育廳副廳長而原來當過漢堡市督學）Hildegard Hamm-Brücher女士曾說：「過去十個月的變動，比以前十八個年頭的變化還要劇烈」（註一），這些事情，是她過去當漢堡市督學時，以三個月光陰親自調查西德各邦的教育，所發表的結論。她的調查工作，是在一九六四年；而這一年乃是「西德教育改革告一段落」（註二）的「漢堡協定」成立之年，恰巧西德學術審議會發表白皮書「成熟證書與大學生」（註三），也在一九六四年，足知一九六四年是西德教育改革，畫時代的一年。普來斯拉氏曾說，這是教育改革告一個段落，同時也是向未來打開新時代的一年。一九六四年是西德教育政策大轉變，由平飛轉向高飛而且加快速度的一年。換句話說，這是「由理念到政策的重要轉換」。過去談教育改革的問題，皆停留在抽象的「理念」階段，而今日已轉向具體「政策」的階段，無論新聞、雜誌、學術書籍等，突然不再提「教育理念」，大量地討論「教育政策」、「教育計畫」等問題；好像是專講教育理念

的「傳統教育學者」突然退場（註四），而由專論教育政策的一群所謂「現代教育學者」（註五）或「教育政策家」全部登場的景象，這就是近西德教育界的現狀。

由「理念」到「政策」的轉變，在邦的「教育王國」（註六）裏也發生重大的演變。即在「理念」的階段，教育改革的標準，都是依據聯邦政府的「勒門計畫」（一九五九年）、或SPD、或教師聯盟的「布列門計畫」等，但是那些改革計畫究竟有多少實際效果，是令人懷疑的。自從一九六四年由聯邦各教育廳長共同制定「關於學校制定統一的聯邦與各邦新協定」（即漢堡協定）以後，一九六六年又為策定全國教育計畫而設置「教育審議會」（Bildungsrat），一方面聯邦對於各邦教育上的干與加強，另一方面邦（教育王國）本身亦開始注意其他邦的教育措施，檢討本邦的教育比別邦的教育，有何優點？有何缺點或落伍？經過相互比較的結果，終於導致全國性各邦的教育競爭。目前在聯邦內為消除教育水準的差異，正在進行熱烈的教育競爭，其導火線也許是柏林大學教育經濟學者艾丁（Edding, F.），他曾以國際性範圍，用具體的數字，指摘聯邦內各地教育水準的差異和國際性教育水準的差異而引起各方注意；接着皮希德（Georg Picht）亦出版一本「教育的危機」（註六），對於朝野作廣泛的呼籲；後來漢·布呂哈（Hamm-Bruecher）女士亦從事三個月的實態調查，然後

在報紙上很具體地把實態報導出來。

改革的焦點

由「理念」向「政策」移動的教育改革，主要焦點有二：(a)國民中學（Hauptschule）的建立構想，(b)中等教育之擴充（為擴大高等教育而作）。所謂國民中學（Hauptschule）這個名稱，是想把原來國民學校高級部（五至八年級）改造成一種中學，俾不能進古典中學或實科中學的學生，在十二歲至十六歲之間都能進這類中學，因為其數量相當可觀，約佔同齡人口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所以可視為教育制度改革的出發點或中心點，也可說是最基本的工作。居於教育制度關鍵地位的國民中學，是如何產生的呢？它並不是最近才被想出來的，早在一九五六年的「關於漢堡國民學校改革之勸告」，及一九五九年的「勒門計畫」中，已經有這種構想。最近西德教育制度委員會的第七次報告「關於國民中學的勸告」（一九六四），才正式說明國民中學，一方面是普通教育的學校，另一方面也是職業教育「準備階段」（Eingangsstufe）的學校，它是構成「第二教育進路」的一部份（註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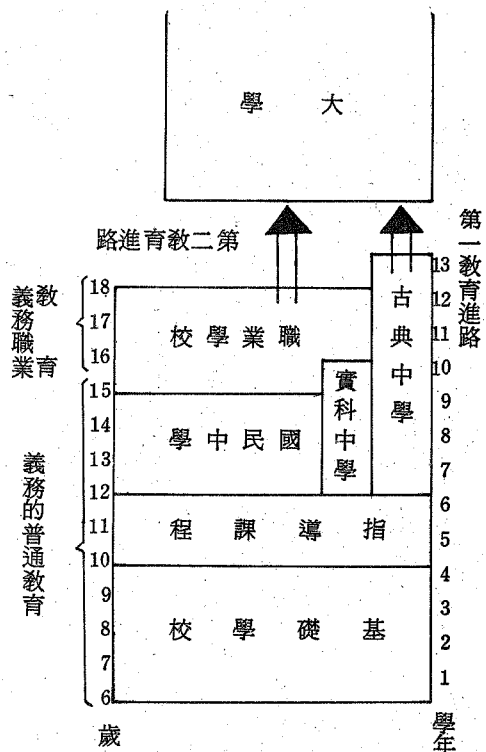
改革的另一焦點，是擴充中等教育。這個問題與高等教育人口的擴充需要，有密切的關係。以前艾丁教授等曾以國際比較的方式一再警告，西德高等教育的人口比其他工業先進國家少得多。為改善此問題，各方才根據人才需求的現代觀點、及保障青年受更高教育的權利，開始檢討如何增加大學入學資格者（Abiturienten）的有效方案。

中等教育的擴充

此處所謂中等教育的擴充，實際上就是大學入學資格者的大量擴充。西德的中等教育學校（weiterführende Schule）可包括：(1)古典中學，(2)實科中學，(3)國民中學（或國民學校高級部）及職業學校，但因其普通教育義務制係九年（六歲至十五歲），所以十五歲以下的青少年全部都在全日制的學校求學。但是西德十五歲以上的青年在全日制學校肄業者比率並不高。對於那些

受完義務教育而不再升學者，原則上規定仍須接受三年部份時間的職業學校課程，因此西德青年在十八歲以前，全部都在全日制或部份時間的學校受教育。由此觀之，如果把部份時間的職業學校包括在內，西德的中等教育可以說已為全體青少年開放了。現在要進一步考慮中等教育的擴充，他們都會異口同聲主張大量增加大學入學資格者。

下圖是西德現行的學校系統圖。



二、擴充中等教育的要求與障礙

(一)兩種要求

希望擴大大學入學資格者（即考取成熟證書者）的壓力，是來自兩方面的要求。第一，是為配合急速發展的科學技術所產生的人才需求，這是從勞動力需要而來的現代化要求。第二，是從市民權利的立場，希望擴大受教育權利的要求。前者的代表人物，就是教育經濟學者艾丁氏，他的歷史的國際的比較研究，及對於將來長期的預估，已獲得經濟界人士的有力支持，現在已被採納於政策之中。後者以社會學者達連特夫（R.

Dahrendorf)爲代表，他主張：「教育乃是市民的權利」(註八)，他的想法亦代表柏林教育改革的思潮。

稀少的大學入學資格取得者：

請看下表：各國同齡者入大學人數的比率

國 名	年齡	1950年	1959年	1970年
美 國	17	59.0%	65.5%	79.5%
希 臘	18	12.0	15.0	25.0
愛 爾 蘭	18	8.0	13.0	24.0
南斯拉夫	19	6.0	11.5	25.0
挪 威	19	10.0	11.5	22.0
法 國	19	5.0	11.0	19.0
比 利 時	18	6.5	11.0	15.0
瑞 典	20	6.5	11.0	22.0
奧 國	18½	7.0	10.0	14.0
英 國	18	4.0	6.0	9.5
義 大 利	18½	4.0	6.0	12.5
丹 麥	18½	4.5	6.0	11.5
荷 蘭	19	5.0	6.0	9.0
西 德	20	4.2	5.0	6.8

從表中可以比較，西德取得大學入學資格者的比率，比其他國家偏低，其過去如此，將來也不會增加太多。西德學術評議會所訂的目標，希望一九八〇年以前達到十二%。

下表是艾丁氏所製的各國大學入學人數之增加率：

國 名	1959	1970	增加率
愛 爾 蘭	6,200	12,000	92%
南斯拉夫	38,100	94,400	148
挪 威	4,900	13,000	165
法 國	59,100	150,000	254
比 利 時	10,400	20,800	100
瑞 典	10,500	25,000	138
英 國	37,000	61,700	67
義 大 利	55,600	116,600	110
丹 麥	3,800	8,500	124
荷 蘭	10,000	20,000	100
西 德	51,400	53,300	4

此表是根據OECD之資料製成者，艾氏認爲各國大學入學的人數自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之間都有飛躍的增加，只有西德是例外，其增加

率是最低的。例如法國是增加二五四%，而西德則只增加四%，幾乎沒有變化的狀態。足見西德取得大學入學資格者的比率，一向很低，而且將來也很難大幅度的增加。

受教育權之擴大：

擴充中等教育的第二種要求，是從不滿現況而發出的，他們不滿意「爲什麼」能取得大學入學資格者，如此稀少；他們覺得這是因爲「國民受教育的權利未受保障的緣故」，因之他們希望中等教育的機會大量擴充。

達連特夫認爲西德的教育政策，已面臨非常緊急而嚴重的「市民權」問題，它與美國黑人問題同樣重要。他強調在西德取得大學入學資格者如此少，是因中等教育的機會未受平等的保障所致。爲此，他不以取得大學入學資格者太少的唯一理由而要求擴充中等教育，他進一步主張徹底改革古典中學的教育，以大量擴充國民受中等教育的機會，如此一來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他強調大學入學比率的多寡不是教育改革的指標，如何保障教育權利，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指標。

另外，赫森邦教育廳副廳長Hamm-Brücher，H也發現「教育的機會，南與北、東與西，有顯著的差別」，因此她說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之(3)規定「生活關係應以整個聯邦維持統一爲理想」，當前的問題似乎與此項規定相違背。

大學入學資格取得率特低的人群：

如果把大學入學資格取得者的經濟背景、地域、性別、宗教等因素作分析，也可以發現大學入學資格取得率特低的人群。這些人因缺少受教育的機會，其智慧能力是被埋沒的。這些人可分爲下列四種：

- (a) 農民的子弟。
- (b) 勞工的子弟。
- (c) 女性。
- (d) 天主教徒。

既然上述四種人群比其他人群取得大學入學資格的比率偏低，在政策上應該保障他們增加取得的機會，因爲從統計學上可以知道優秀的潛能被埋沒最多的是這四種人群。

第一、農村的入學資格取得率偏低，從各邦的比較也可發現十分懸殊。例如大都市的柏林及布列門等的比率是達十%左右，赫森因農村學校改革（Landesschulreform）順利、實施學校的統合、並作第五至第九學年的「分化」與「指導課程」實驗，實施得較普及，所以其大學入學資格取得率也不低。至於入學率最低的農村地帶，只要認真宣傳中等及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其入學率也會改觀的。例如某大學曾於一九六五年派一百廿名學生到南巴登地方的四百個農村，啓發農民的結果，第二年該地方的實科中學入學人數就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第二、勞工階級的子弟入大學的比率亦甚低。這是由於傳統上勞動階級與升學系統的社會距離差得太遠的緣故，這種現象導致兩種階級的互不信賴，勞動者對於子弟就讀古典中學之事完全絕望，連想都不敢想，因此西德總人口當中勞工雖佔半數左右，可是大學生的比率僅僅佔5%而已。

下表是各國勞動階級出身的大學生比率：

國 名	百分比
西 德	5.2 %
東 德	50.0
法 國	7.0
瑞 典	20.0
美 國	30.0
英 國	25.0

繆勒（Mueller, K. V.）曾調查過古典中學學生的家庭背景，指出其中百分之八十四以上都是中流階級以上的家庭（註九）。為何勞工階級的子弟升學率如此低呢？根據西德最近的輿論調查，認為學校與勞工家庭的連絡溝通不夠，尤其是學校對他們太消極，應負很大的責任。

第三、女生取得大學入學資格的比率低，從下面表格的性別比較也可以看得清楚：（男性佔七十七點七，女性只有廿二點三%）：

類 別	人口比率	高在等學教比率
地 農 村	23 %	5 %
中小都市	46	42
域 大 都 市	31	53
職 勞 工	49	5
農 民	15	2
公 務 員	5	34
公 司 員	18	26
業 自 家 營 業	11	18
自 由 業	2	15
性 男 性	47	77.7
別 女 性	53	22.3
宗 天 主 教	45	35
教 基 督 教	47	62

在中等教育階段，如古典中學的三年級學生中，女生佔四十一%，但到畢業時取得大學入學資格者降為三十六%，而真正入學者只有二十六%而已，足見其降低幅度頗大。

第四、天主教徒能取得大學入學資格者也不多。西德全人口中天主教徒佔四十五%之多，但是天主教徒能進大學者僅佔大學生人數的三十五%而已。這種現象非僅限於高等教育階段，幾乎各教育階段都是如此。針對此問題，一九六四年在休特得高爾舉行天主教會議時（Katholikentag）曾討論改善的對策。他們認為這是「天主教徒的教育劣勢」（Katholische Bildungsdefizit）。拜葉邦的教育廳長胡伯爾（Huber, L.）在一九六五年的預算中，特地列一筆可觀的經費，要求辦理學校統合（希望天主教徒不要分離），而且請天主教教會也支持此命令。

以上所介紹的，是由中學升大學較不利的四種人群，茲後要釐訂人才開發與擴大教育機會的政策，在地域上應注重農村，在職業上宜注重勞工及農民，在性別上應注重女性，在宗教上應注重天主教徒才對。概括起來說「農村的勞動階級的天主教徒的女子」（Katholische Maedchen der Arbeiterklasse auf dem Lande）應作為

今後西德教育政策之重點。

(二)兩種障礙

為滿足中等教育擴充的要求，西德學術評議會曾計畫，到一九八〇年以前把現在的大學入學資格取得率七點四%，提高到十二%，使同年齡人口的十六至二十%能夠進入古典中學，而使其中的四十至六十%都能取得大學入學資格。但是這種計畫似乎不太樂觀，因為還有許多阻礙的因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兩種障礙，一為「教育的地方分權問題」或曰十一個教育王國的存在，另一為高級中學（即古典中學）教育內在的障礙。前者可謂西德教育改革方面一般共同的障礙，而後者可謂中等教育擴充方面的障礙。

一般都指責教育的地方分權制（或稱教育的聯邦制）是西德教育改革最嚴重的阻礙。赫克爾（Heckel, H.）、皮希特（Picht, G.）及漢·布呂哈（Hamm Brücher）等亦一致認為西德缺乏強有力推動教育政策的教育部，是教育改革遲遲不進的主要原因。德國一向把教育大權讓給各邦，使各邦都變成了「教育王國」，極力排斥聯邦政府的干涉，這是該國歷史性的產物，也是政治多樣性的產物。現在他們已經逐漸領悟聯邦政府迫切需要設置教育部，所以「學術評議會」或「教育審議會」設置以後，已經逐漸接近解決的方向。

其次關於古典中學教育內在的障礙，主要是「選拔」（Auslese）和「留級生」（Sitzbleiber）的問題。

從消極的選拔到積極的選拔：

選拔制度的理想或目的，並不僅是決定及格、不及格的「消極選拔」（negative Auslese），應該是適應學生個別分途而積極指導的「積極選拔」（Positive Auslese）才對。西德一向很注意積極選拔方式的「試驗教學」（Probeunterrichts）（約需經過三日至兩週的觀察），這種考試（Pruefung）已經沒有考試的形態，也許把它稱為「入學手續」更加恰當（註十一）。現在進一步想把「試驗教學」改為兩年的「指導

課程」亦即個性觀察階段，但是在現行的教育制度之下，這種用意良善的積極選拔，恐怕也很難實現預期的目標。

衆多的原班留級者：

西德的高級中學（即指古典中學）對於學生的成績考查一向是非常嚴格的。根據Niedersachsen邦的統計，每年被留級的人數，約佔十%左右，最後到畢業時能取得大學入學資格者只剩下原來入學時的半數以下而已（註十二）。

本表是Niedersachsen邦古典中學的留級狀況。

年 度	學 年	男 生	留 級 者
1954	七	9,121 人	11.3 %
1955	八	8,094	11.6 %
1956	九	7,152	5.2 %
1957	十	6,782	12.9 %
1958	十一	5,904	9.4 %
1959	十二	5,350	13.5 %
1960	十三	4,630	5.2 %
1961	畢業者	4,389	0

再就整個西德來看，能取得大學入學資格的人數，只佔第七學年（高中入學）人數的四十點八%（一九六二年）。因為從高中入學到畢業，總共約留級脫落了五十二點八%，故大學入學資格的取得率自然偏低。

一九五七至六十二年西德大學入學資格取得率如下：

比 率	同 齡 中 入 古 典 中 學 三 年	級 學 生 所 佔 的 比 率	同 齡 中 取 得 大 學	入 學 資 格 的 比 率	畢 業 取 得 大 學 入 學 資 格	者 與 高 中 入 學 人 數 比 率
年 度						
1957年	17.8 %		4.7 %		35.2 %	
1958	15.5 %		4.8 %		39.9 %	
1959	16.7 %		5.1 %		39.1 %	
1960	16.8 %		5.5 %		39.4 %	
1961	16.5 %		6.1 %		41.0 %	
1962	16.1 %		6.8 %		41.8 %	

高中學生留級者太多，主要還是因為古典中學的教育，依然根據傳統的教育作風所致。更具體地說，古典中學的課程，依然以古典、語言學、數學為中心，使學生無法消化的緣故。依照傳統的歐洲教育，皆特別重視古典學科，而且語言學要求學習三個國家的語言，這是相當繁重的負擔。這些課程內容的問題，與現代實際需要未必有密切的關聯，是造成留級人數眾多的主要原因。

三、擴充中等教育的方案

——滿足需要與消除障礙——

欲考慮擴充中等教育之對策，一方面要滿足「需要」，另一方面要消除障礙才行。為滿足需要，應開闢「第二教育進路」；為消除障礙，應設置「指導課程」的階段。

(一)第二教育進路 (Zweiter Bildungsweg)

第二教育進路的理念：

所謂「第二教育進路」，就是「不經過古典中學的途徑，也可以進入大學的另一條途徑」。這是根據擴充中等教育的兩種要求——人才的需要，及教育機會的保障與擴大——所設計出來的妥協性方案，自從一九五〇年以來逐漸變成一種新的制度。依照過去的教育制度，進大學的方法原則上只有「基礎學校→古典中學→大學」這一條英才教育的途徑。如果把舊的途徑稱為「傳統的第一條（普通）教育的進路」，那麼它以外的進大學途徑，即可稱為「現代的第二條（職業）教育的進路」。

「第二教育進路」，一方面能夠吸收第一進路以外有能力的青年進大學，足以確保人才，可以滿足第一種要求；另一方面又把大學的門戶另外開放給古典中學以外的教育機關，這一點也可以滿足第二種要求。由此觀之，「第二教育進路」乃欲同時滿足兩種要求的妥協產物，正因為它是建立在兩種要求的妥協基礎上，它不能稱為恒久性的制度，充其量只能暫時滿足上述兩種要求而已。謝爾斯基評論「第二教育進路」只不過是

「暫時性的解決對策」，就是這個道理。進一步說，一種教育制度既然可冠以「第一」、「第二」的次序，那麼社會的觀感依然會以第一為「主」，以第二為「從」，那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教育進路的現況：

第二教育進路好像是一種開發「能力預備軍」(Begabungsreserven)的制度，或「打破教育獨佔」(Brechung des Bildungsmonopols)的制度，其理念或使命是不尋常的，但是其現實狀況如何？實際上並不十分順利。例如「第二教育進路」的主要教育機關是Kolleg和夜間的古典中學，這些教育機關的發展都非常緩慢。根據調查，目前「第二教育進路」的教育機關，數量太少，Kolleg總共只有廿五所，夜間古典中學也只有卅三所，而且其設置分佈狀況，各邦頗為懸殊，其普及狀況頗不理想。

因「第二教育進路」的機關太少，故由此途徑進大學的人數並不多，如一九六五年Kolleg只有七百名，夜間古典中學只有八百名，取得大學入學資格，這些名額只佔該年大學入學資格者的三%而已（註十三）。「第二教育進路」的教育機關，除了Kolleg及夜間古典中學以外，有的是附設在職業學校的，種類頗多。一般認為這種學生進大學以後的表現良好。

(二)指導課程 Foederstufe

欲擴大大學入學資格的名額，必須把過去的選拔制度改善，使選拔制度的理想更接近於積極性的選拔意義才行。指導課程的產生，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想出來的一項教育措施。

所謂「指導課程」(Foederstufe)，事實上就是在基礎學校（四年）之上，設置兩年的指導階段。此指導課程之歷史，可追溯到一九四八年在Niedersachsen邦首先付諸實驗的「分化中間課程」(differenzierter Mittelbau)。當時該邦有十三個學校從事實驗，自第五至第八年級的學生（相當於古典中學第一至第四年級）在特定科目方面實施能力分班的教學，其他非特定科目則實施一般的共同教學，其結果百分之九十的

學生都能夠進古典中學。這是非常令人驚異的成果。此「分化中間課程」的構想，在一九五九年西德教育制度委員會所提出的「勒門教育計畫」中，就指定以第五及第六學年的兩年課程為「指導課程」。但如果已明確判定有能力入古典中學者，可不經過指導課程而直接入九年制大學升學準備課程（Studienschule）。一九六〇年教師聯盟所提出的改革案「布勒門計畫」，進一步主張以第五及第六學年的全部學生為對象，設置「中間課程」（Mittelstufe）。後來一九六四年的「漢堡協定」，原則上以第五及第六學年的全部學生為指導對象，而將來如果能明確認定適合於進古典中學或實科中學者，可不經過指導課程而直接升學。當時指導課程的名稱，曾模倣法國，稱為「觀察課程」（Beobachtungstufe）。

指導課程經過這些曲折演變之後，一九六六年在Niedersachsen及Nordrhein-Westfalen兩邦實施，唯在Nordrhein-Westfalen的古典中學，最初的兩年却稱為「判定階段」（Erprobungsstufe）或「預備階段」（Eingangsstufe），似乎比原來指導課程的理念略有倒退之感。其他的邦，有的只採用一部份試行，要看看成果良好才要擴大實施。赫森邦係把農村地區的國民學校統合起來，在Mittelpunktschule設指導課程。柏林的改革，是十一個邦裏面最精彩的一種，該市比指導課程更進一步希望達到綜合制中學之理想，在國民學校六年修完之後，設相當於古典中學、實科中學、國民學校高級部（國民中學）三類的Oberschule，將來使任何類型的Oberschule皆能取得大學入學資格（等於第二教育進路也自然消失）。柏林市與其他的邦不同，採取了這種改革，係因將改革的首要目標放在教育機會的保障與擴大，而將人才開發列為次要目標的緣故。雖然如此，柏林市取得大學入學資格的百分比，仍達十一%，始終保持全西德最高的水準。

此外，為了增加大學入學資格取得率，還有一個障礙，即留級生太多的問題。為解決此問題，在「漢堡協定」已決定第五學年以前不教第三外國語，使中等教育低年級能夠減輕外國語的負

擔。雖然還有提議：希望自基礎學校一直到取得大學入學資格的整個教育年限，由十三年降為十二年，即縮短一學年，以減少每年約有十%留級率的一年份，但是這種提議並未付諸實施（註十四）。唯東德已經改革，能夠在十二年的教育之後，即可取得大學入學資格。

另外，為了改善勞工階級子弟的教育條件，有些古典中學也採取全日指導的措施（Tagesheimschule）。例如：

Duisburg的古典中學有勞工子弟佔三十七%，對他們每天下午都實施教學，其成果相當良好。可惜這種學校並不多。

四、教育改革的展望

——教育學與教育政策——

最近西德教育改革的趨勢，是從「理念」到「政策」的轉變，為其主要特徵。但是這種「政策」的產生，並非由「傳統的教育學者」提出的，而是由教育學以外的社會學、經濟學、法律學等所謂「現代的教育學者」所提出來的。傳統的教育學者均認為那些人所提出的「政策」，皆缺少「教育學」的根基。正因如此，今後西德教育改革的成敗，正在考驗「缺少教育學之政策」（Politik ohne Paedagogik）能得到多少教育界的合作？現代教育學者能得到多少傳統教育學者的協助，或經得起挑戰而定。關於大學入學資格者的增加問題，擬從這種觀點來檢討，作為結論。

如何增加大學入學資格的名額，已經成為今日西德教育上最重要的問題。但是量的擴充，會不會導致質的降低？這是古典中學的教師最感不安的問題。那麼問題的關鍵是：不降低大學入學的水準，是否能在量方面增加？如果有此可能性，那麼其具體的辦法如何？欲解決此問題，可從兩個觀點來加以考慮（註十五）：第一是古典中學制度的改革，即古典中學的多樣化，及大學入學資格的多樣化；第二是古典中學教育條件的改善。

（一）古典中學的多樣化與大學入學資格的多樣化

關於古典中學多樣化的改革，在一九五九年

「勒門計劃」中，已經提出「九年制Studienschule」和「七年制古典中學」的二元化構想。前者乃是過去傳統古典中學的續存，而後者乃應現代化之要求而增設者。社會學者謝爾斯基對於這種傳統與現代並立的二元化構造，曾作強烈的批評，認為那是現代社會上到處存在的分裂傾向。

西德的教育改革由「理念」轉向「政策」作決定性演變的「漢堡協定」（一九六四），也提倡古典中學的多樣化。該協定提示，除原來的古典中學外，應增設「教育及音樂古典中學」（畢業後可入教育大學）、及「社會科學古典中學」。因鑑於從事教育工作的女性愈來愈多，「教育及音樂古典中學」乃預定以女生為主要對象的新型高中。

上述「勒門計劃」及「漢堡協定」，對於古典中學多元化的構想，皆不想改變原來古典中學的現狀，而只想增設新型的中學而已。傳統的教育學者認為這是不夠的，他們主張應該直接改革傳統的古典中學，使其高年級「分化」，並使大學入學資格「分化」才對。例如哥廷根大學心理學教授羅特（Roth）認為要大學入學資格者增加，不應只從人力需求的觀點來考慮，應該從教育學的立場，正面研究如何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Lernstrengungen）才對。他批評那些「教育政策家」自居的所謂「現代教育專家」，在政策上缺乏教育上的顧慮。因此他主張首先應考慮古典中學高年級的分化和大學入學資格的多元化（註十六）。

羅特建議古典中學高年級分化的理由之一，是希望減輕拉丁語、希臘語等古文學習的負擔。關於這方面的改善措施，原來在制度上已經把古典中學的課程，分為古典語系統、現代語系統、自然科學系統三類，已經多少減輕了負擔，但是羅特認為希臘語或拉丁語寧可保留而不學習，使高年級更為分化。

他主張古典中學分化的第二理由，是希望與大學的學術分化相對應。既然大學的學術已分化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領域，古典中學的高年級至少也可以考慮相對應的分化。他

以瑞典的教育改革為例，說明瑞典的高中已取銷拉丁語必修的規定，在高年級（十七至十九歲）設人文科學、國家學、經濟學、自然科學、技術學等分化課程（但七十％的科目共同，只有三十％分化），所以他要求西德應仿瑞典，在高年級實施分化課程，並且使成熟證書也分化。原來「成熟證書」的意義，就是「大學入學資格證書」，可以進大學的任何學院。他要求成熟證書的多樣化，就是意味「特定學院入學資格證書」（Fakultaetsreife）的制度化。

（二）古典中學教育條件的改善

欲增加大學入學資格的人數，自然需要增加古典中學的學生數，但是不希望降低其教育水準。為此，第二對策就得考慮古典中學教育條件的改善。具體的辦法是：（1）減少班級人數，（2）增加中學教師的編制，（3）改善物質設備條件等。這些條件，在聯邦教育廳長會議所訂的「一九六一至一九七〇年長期計劃」中，對於國民學校及中間學校有詳細的規定，對於古典中學也同樣提到（註十七）。根據該計劃，古典中學的學生數，需由原來的八十五萬人（一九六一）增到九十五萬人（一九七〇）；教師人數需由四萬七千多人增到九萬多人（約兩倍）；班級規模由二十七點七人將減為二十人；每班級教師人數希達到一點七八人。這些數字，都是從教育學的立場所訂的理想目標值（Zielwerte vom pädagogisch wünschenswerten Stand aus）。像這種聯邦教育廳長會議的計劃，能具體提出「教育學上理想的目標值，足以證明政策對於教育學已有貢獻，但是這些理想真正能夠實現，使理想變成現實，才能說教育學與教育政策已經發生密切的關聯。

以上把教育學與教育政策的關係，只從大學入學資格者的擴充方面略加以討論，就整個而言，教育學與教育政策的關係問題，早在四十年前施普朗格（E. Spranger）已經談論過（註十八）。四十年後的今天，又發生兩者的關係問題，其背景與西德大學裏的教育學講座編制問題有關

，與教科系至今仍屬於哲學院的一部份，也有關係。蓋斯勒氏（G. Geisler）稱此為「大學裏教育學的分化與教育學院的問題」（註十九）。教育學如果想對教育政策有更積極的貢獻，傳統的教育學者應對於教育實際問題，作實證的研究才有提出具體改革政策的可能性。皮希特在「德國教育之危機」中所提出的問題，也是指摘德國教育的缺點，只作消極性的調查研究而提不出積極的政策。今後亟需作直接對政策有關的積極性調查研究，因此教育學領域裏應該培養更多實證的研究人才，為教育政策多作一些貢獻。

- 註一 Hildegard Hamm-Bruecher: Auf Kosten unserer Kinder? 1965, S. 115.
- 註二 Gottfried preissl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und Bildungspolitik (in: Die Deutsche Schule, 1965,) S. 353.
- 註三 Wissenschaftsrat: Abiturienten und Studenten, 1964
- 註四 Ursula K. Springer: West Germany's turn to Bildungspolitik in educational planning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Februr 1965) P. 11
- 註五 Heinrich Roth: Paedagogik und Bildungspolitik (in: Die Deutsche Schule, Heft 5, 1966), S. 303.
- 註六 F. Eding: Die Schulausgaben 1960-1970, 1960, R.V. Carnap und F. Edding: Der relative Schulbesuch in den Laendern der Bundesrepublik 1952-1960, 1962
- 註七 Empfehlungen und Gutachten des Deutschen Ausschusses für das Erziehungs und Bildungswesen, Folge 7, Empfehlhngen zum Aufbau der Hauptschule, 1964.
- 註八 R. Dahrendorf: Bildung ist Bürgerrecht, 1965.

- 註九 K. V. Müller: Begabung und Soziale Schichtung in der hochindustrialisierten Gesellschaft, 1956.
- 註十 Die Welt vom 26, Juni 1964.
- 註十一 H. Heckel und P. Seipp: Schulrechtskunde, 1965, S. 313ff.
- 註十二 Klausweltner: Der mittelstufenabschluss der höheren Schule in der Schulstatistik (in: Die Deutsche Schule, Heft I, 1963)
- 註十三 Erwin Schuppe: Zur Weiterentwicklung des Zweiter Bildungsweges (in: Becker u.a.: Analysen und Modelle zur Schulreform, 1966), S. 60
- 註十四 John H. Van de Graaff: West Germany's Abitur quota and school reform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February 1966) P. 84
- 註十五 Oskar Anweiler: Bemerkungen zum Quantitaets und Qualitaetsproblem der gymnasialen Ausbildung (in: Bildung und Erziehung, Heft 4, 1965)
- 註十六 H. Roth: Zweilei Abitur? (in: Die Deutsche Schule, 1965, S. 438ff)
- 註十七 Ständige Konferenz der Kultusminister der Länd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darfsfeststellung 1966 bis 1970, 1962.
- 註十八 E. Spranger: Die Wissenschaftliche Grundlagen der Schulverfassungsgere und Schulpolitik, 1927.
- 註十九 G. Geisler: Die Differenzierung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in der Universität und das Problem einer Paedagogische Fakultät (in: Zeitschrift für paedagogik, Heft I, 1964.)